



AYUB KHAN

阿尔塔夫·高哈 著
邓俊秉 译

阿尤布·汗

——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

阿尤布·汗

——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

阿尔塔夫·高哈 著

邓俊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巴基)高哈(Gauhar, A.)著;邓俊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3

书名原文:Ayub Khan, Pakistan's First Military Ruler

ISBN 7-5012-1653-3

I. 阿… II. ①高…②邓… III. 阿尤布·汗——生平事迹

IV. K833.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095 号

图字:01-2001-4212

书 名 **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

责任编辑 凌 飞 龚玲琳

封面设计 郭宝珍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雅 玲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65122235

邮政编码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12 印张 290 千字 1 插页

版次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简介

四川广安县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留校任教14年。1977~1980年借调在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工作。1981~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1986年应英国学术院邀请,在牛津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1988年调入外交部,13年来,先后随丈夫周刚大使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使馆工作。除社科院授予的教授学衔外,在使馆任副司级参赞。

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曾发表了《英国》一书的教育制度部分以及介绍英著名学者 Joseph Needham 等学术专著。翻译了《英国解剖》等著作。驻外业余时间,先后翻译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的《音乐——我终身之乐趣》、《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等书。策划出版了《B·J·哈比比的生活与事业》(哈于1998~2000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和印度总统夫人乌莎女士的译作《甜与酸》两书的中文版。



1991年7月初，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周刚及夫人邓俊秉教授（本书译者）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戈哈尔·阿尤布（即阿尤布·汗的长子）白沙瓦的府第做客。中国大使夫妇与戈哈尔·阿尤布夫妇正在欣赏阿尤布·汗家族的相册。





作者简介

阿尔塔夫·高哈，作为陆军元帅阿尤布·汗执政时的新闻秘书，是政权的维护者。1971年他接管了《黎明报》，成为该报的主编时，却成为一名勇于抨击政权的人。他在表明和揭露佐勒菲卡尔·布托的“人民”政权所包涵的独裁痕迹时，为巴基斯坦的新闻报道方面开创了先河。巴基斯坦军队侵犯东巴时，这是一次巴基斯坦军队不光彩地向印度人投降而告终的毫无意义和残酷的冒险，他亦抨击了巴基斯坦军队扮演的角色。为此，阿尔塔夫·高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他被捕入狱的13个月中，禁止他写作。他被大赦国际作为“有良知的犯人”而接纳，而且，信德和俾路支省高级法院裁定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他前往伦敦，与别人共同创立了《卫报第三世界评论》并成为这个刊物的共同编辑之一。1978年，他因开创性报道而获得了英国新闻奖。他成为权威性的第三世界月刊《南方》的主编和季刊《第三世界》的编辑。1991年，他回到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日报的主编。

目 录

第一部分

- 5 前言：个人随笔
- 24 主人公简介

第二部分

- 47 第一章 得益于反思
- 75 第二章 戎马生涯
- 108 第三章 寻求合法性
- 133 第四章 走国际钢丝
- 173 第五章 克什米尔局势
- 187 第六章 总统选举
- 199 第七章 返回国际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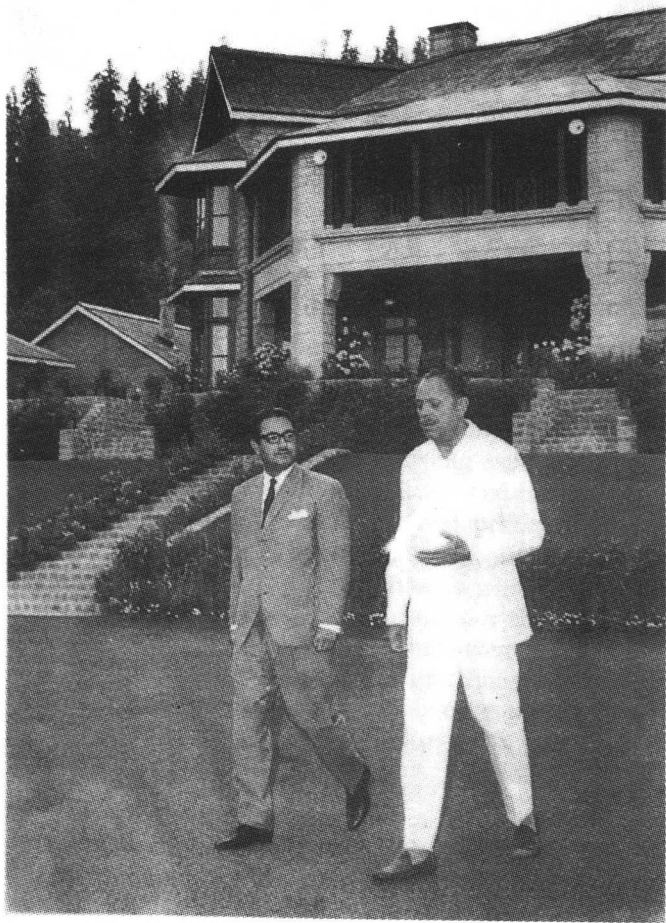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 227 第八章 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铤而走险
- 247 第九章 战争
- 263 第十章 通向塔什干之路
- 286 第十一章 塔什干会谈的反响

295	第十二章 灰心丧气
313	第十三章 时代的终结
346	第十四章 结论
	附 录
357	尼赫鲁信札
371	译者的话
374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的贺词

第一部分

献 给
扎里娜（作者夫人）
感谢她的真爱和勇气



阿尤布·汗与阿尔塔夫·高哈在纳瑟加利政府贵宾楼
(1967年7月23日)。

前言：个人随笔

本书的形成劳神耗时——经历了孤独、研究和思考，还包括长期沉湎于纯属惰性的 23 年。无论是在被单独监禁的阴暗日子里，还是在“旅居”外国的岁月中，写作的激情从未离开过我。当我在巴基斯坦度日如年时，1976 年来自英联邦研究所的邀请给我提供了一条出路。这个研究机构让我使用它们在伦敦的资料设施，并以之为基地，就 1958~1969 年间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对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时代进行写作。这确实是一次受益匪浅的经历，不仅仅是因为研究所的同事们以及后来的记者同仁们对我给予的深切关怀，更是因为我学会了不必担惊受怕地写作。当你可以自由在地奋笔疾书时，这种感觉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如同在大多数其他穆斯林国家一样，在巴基斯坦，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奢望。令人欣慰的是，1978 年，作为《卫报第三世界评论》的编辑之一，我工作不到一年，就获得了英国新闻奖。

过去 24 年以来，我先是为印度政府服务，接着又为巴基斯坦政府工作。然而，迫于形势，现在我却成了一名记者。在巴基斯坦，官僚可以成为总理和总统，记者却不行。就我来说，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在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手下，担任了 5 年多新闻广播部的头头；按照批评我的人的话说，我总是压制新闻界。的确，我没有抨击新闻出版物法令——这个控制（舆论）的工具，即便我同它的出台毫无关系。当时，许多报纸承认，在我被任命

为新闻秘书后，我曾劝说阿尤布·汗将该法令搁置起来。我记得在我极力向阿尤布·汗说明这一法令的很多条款非常僵硬，甚至不符合实际时，他对我说：“你才上任。你不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新闻界。这些报纸老板都是些投机分子和只想捞钱的家伙。”我据理力争：“总统先生，不论新闻界是什么样的，总有某些事政府是绝不该也不能做的。”这个理由终于被认可，阿尤布·汗同意废除一些更加咄咄逼人的条文。但是随着1969年阿尤布·汗的隐退，直到我离开政府部门担任巴基斯坦最老的英文日报《黎明》的编辑，变成一名彻头彻尾侵犯他人权限的报人时，我才开始理解新闻界的运作情况。我汲取的教训是，作为官方宣传的工具新闻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既无信誉，又无影响。新闻界可以不断塑造政府的“成就”，压制批评，对改变公众舆论却无能为力。新闻界本该仅有一个宗旨，即始终将政府处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并要求政府负起责任。这一原本再明白不过的事理却总是在独裁政权下第一个被扭曲。每靠近掌权者一步，你眼前就多一层纱布，结果使你看不清身处远处的其他人能看清的东西。只有在你离开这个魔圈之后，蒙眼的纱布才开始消失，你才会面对那些一目了然的事。

我在伦敦主编了两个期刊，一是《南方》月刊，另一个是《第三世界》季刊，发行量均相当可观，并在1978~1990年间颇有影响，但它们却从未受到任何第三世界国家统治者的青睐。在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掌握人民命运和操纵他们生活的国王、酋长、政教合一的阿訇和将军们对由一个“兄弟”主编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刊物是不会感到舒服的。起初，一些西方学者和记者，以异常怀疑的态度看待《南方》这个进入他们地盘的入侵者，然而经过一、两年后，他们开始尊重后者独立且强有力的编道方针。这两个期刊逐渐被视为南北之间交流的重要渠道。《南方》和《第三世界》得到第三世界基金会的支持，后者已发

展成为讨论发展中国家人民问题和愿望的强大论坛。我非常荣幸能同基金会建立联系，并在十四年之后作为秘书长为其服务。基金会设立了极具权威的第三世界奖，颁发给理解发展中国家人民问题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国家领导人和学者。接受该奖的有像劳尔·普雷维奇、纳尔逊·曼德拉、鲍勃·格尔多夫、朱利叶斯·尼雷尔和维利·勃兰特这些知名学者和国家领导人。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在拉美、非洲和亚洲到处旅行，考察独裁统治，尤其是考察穆斯林国家的一些专制政权的不同模式。我拜访了一些独裁者和很多独裁政权下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受害人。这是洗心革面的经历，帮助我了解当我是阿尤布·汗的一个亲密助手时人民所经受的苦难。不仅如此，它使我能宏观地从五花八门独裁统治的视角来研究阿尤布·汗和他的政府体制。我颇为震惊地认识到，在阿尤布·汗进行独裁统治的谋划之中，人们必定把我视作一个工具而不是个顾问。

光阴的流逝令人释怀，要是你幸运的话，它也会使你公允而超脱地看待你可能作为代理人或参与者所涉及的事件。往事是无法改变现实的，然而，在反思和回顾的过程中，它的确会发生变化。由于回忆往事从来不可能是完整的，反思往往是主观的，个人对事件的叙述决不能作为可依赖的完整和客观的东西。对于可能引发公众争议和不满的事件尤其如此。参与制定公众政策的人们总难免受到他们惯于为任何不受欢迎的决策作辩解而将其后果大事化小的指控。决策者很难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尽管他们对事件的追忆和陈述往往成为历史的主要依据。他们甚至被剥夺了事后对事件认识的福分。

任何决策者都可有事后缄口不语的选择。他们大多数宁愿将他们的追忆带进坟墓。我偏巧是阿尤布·汗政府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在他在位的最后6年（1963~1969），我是他的日志记录人、演讲撰稿人、顾问及主要助手之一。我欣赏他把握问题的能力以

及下达指示和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的坚决和果断的态度。我不满意他的政府体制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大选的策划。但我的不快从未超出忠诚的界限。在任何专制政府内，忠于统治者已成为最高的价值和对于一个人能力的最终考验。在你还未明白过来时，你已成了一个谄媚的人。鉴于我既痛苦又欣慰地参与了阿尤布政权的好几件大事，这些事件在巴基斯坦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迹，我始终感到自己有义务来陈述这些事件——这或许是第一位当时的“知情者”对该时期所作的叙述。

为了澄清自己那些年的立场和自己所起的作用我花了一些时间，来克服内心的不安。一些朋友认为我应对自己曾起过的作用加以解释，而不是撰写那一时期的历史。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这个难题由接替阿尤布·汗的统治者解决了。他们对我提出一大串指控，从滥用权力到叛国，我被拘禁了一年多，并被大赦国际称为有良心的犯人。所有对我的指控，就像拘禁我的理由，均被法庭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起初在军事法庭，阿尤布·汗的接班人叶海亚·汗对我的诉讼由于我拒绝出庭，而演变成了一场闹剧。甚至在无视他自己制定的仲裁规定的情况下，叶海亚·汗得意地将我解职。两年后叶海亚·汗得到报应，基于我夫人扎里娜提出的上诉，他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为篡权者，其一切行为均是非法的。

在受迫害和监禁期间，有一些时刻令人难忘。在卡拉奇一个闷热的早上，我的朋友和律师伊贾兹·侯赛因在法庭上举起双手质问：“克霍贾律师是何许人？法庭是干什么的？”这一振臂高呼引起全场惊恐失色。当时，对我的指控是企图用假护照逃离巴基斯坦，而我在携带大量外币和一瓶威士忌逃跑之前就被抓住了。一个表情木然的法官解释，鉴于指控的严重性，政府已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审理此案。这一解释未能让我的律师满意，因为法官除了说克霍贾律师被任命为特别法庭的庭长外，没有说明这一法庭

的地点和组成。在押我回卡拉奇中央监狱的途中，警察一路都在找东西，由于没找到拘留证，我竟被监狱拒之于门外。终于在信德俱乐部，这个商人青睐的地方，发现了克霍贾律师，他正在悠闲地进午餐。当得悉其被任命时，克霍贾嘶哑地说：“我一无所知，我要回家午睡了。”警察一直追踪克霍贾到他位于甘地花园公寓附近的一个单元房寓所。我们从警车走出来时，欢迎我们的是晾晒在微风中飘扬的绚丽多彩的衣服，同卡夫卡审讯如出一辙。我们在一个阴暗的屋里等着，法庭庭长被副警督拽下床，当人们争论在没有法庭其他成员的情况下，庭长不能代表法庭，无权下达任何命令时，睡眠惺忪的克霍贾一个劲地点头表示同意。副警督毕恭毕敬在庭长面前放了一张纸，并告诉他签字的地方。这就结束了整套司法程序。我被押送回监狱，克霍贾则被送回床上。

出席信德和俾路支高级法院首席法官图费尔·阿里·阿伯杜尔·雷赫曼和法克赫鲁丁·G·伊布拉希姆在人身保护令请愿状的听证会上我迎来了一个更加庄重的时刻。我被指控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而首席检察长叶海雅·巴克赫蒂亚，我在奎塔的这位老同学，振振有词指控我的主要证据是在巴基斯坦采取行动残酷镇压达卡的民众骚乱不久我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讲的话。当时，一位才从达卡回来的年轻军官，津津乐道地讲述在达卡市中心滥杀无辜的可怕故事，在这次疯狂的杀戮中，大约有二十个孟加拉人被一个前线侦察兵上校枪杀。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道：“作为一个巴基斯坦人，我感到羞愧。”按照首席检察官的看法，这是为我反巴情绪定性的证据，我承认我说过这番话。而首席大法官却认为，只有在令人痛苦之时爱国的巴基斯坦人才能说这番话。

幸运的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往事了。我不必为了自我表白或开脱自己而累及本书。在本书中，我像其他官员一样，只是被任命扮演新闻秘书的角色。并且也只是在有必要确定参加会议